

# 王士禛与清初唐诗学

孙纪文

(西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宁夏大学 人文学院,宁夏 银川 750021)

**摘要:**王士禛在清初唐宋诗学之争中所作出的最终重返唐音的选择,是与时代风会、个人的诗学倾向息息相关的。王士禛尊崇的唐诗学是兼容的唐诗学,是以唐代诗学精神为价值取向的唐诗学,是建构理论系统的唐诗学。清初唐诗学的曲折挺进为王士禛重新反思唐诗学的得失提供了时间,而王士禛为清初唐诗学的重新建设着实进行了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的不懈努力。

**关键词:**王士禛;清初;唐诗学;宋诗学

**中图分类号:** I207.2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0292(2008)02-0155-05

自从唐、宋两大诗学传统形成以来,“宗唐”、“宗宋”之争,或者说唐、宋诗学之争就成为后代诗人、诗论家面临的重大问题。对此,齐治平先生指出:“唐、宋之争已起,自南宋以迄近代,历时八百年之久,实文学批评史上一大公案,学诗谈艺者不容不注意及此也!”<sup>[1]3</sup>那么,时至清初王士禛(即王渔洋)的时代,唐诗学的状貌如何?尤其是渔洋与清初唐诗学的关联如何?由此展现出的深层学理问题是什么?就成为本文着重探讨的话题。

时至清初,唐诗学受到宋诗学的强烈冲击,从而形成两派争辩的形势。这种形势的萌发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的诗学风气。第一是反思的风气。即明代唐诗学的空疏流弊引起时人的反思,促动诗论家从学理上兴起反击明代唐诗学而崇尚宋诗学的思潮。《四库全书总目》之《精华录》提要云:“当我朝开国之初,人皆厌明代王、李之肤廓,钟、谭之纤仄,于是谈诗者竞尚宋、元。”<sup>[2]1522</sup>由此可见时人对于七子派、竟陵派诗学的反戈程度。而清初诗论家的论述更能传达出这种思潮的声音。黄宗羲就曾站在折中唐、宋诗学的广阔立场上,对唯唐诗学为能事的诗学主张表示不满,并对“诗必盛唐”之论力持异议。他在《诗历·题辞》中说:“今于上下数千年之中,而必欲一之以唐,于唐数百年之中,而必欲一之以盛唐。盛唐之诗,岂其不佳,然盛唐之平奇浓淡,亦未尝归一,将又何适所从耶?是故论诗者但当辨其真伪,不当拘于家数。”<sup>[3]204-205</sup>他还曾明确指出宋诗的价值,《张心友诗序》说道:“诗不当以时代而论,宋、元各有优长。”<sup>[4]50</sup>而作为明末清初诗坛“宗主”的钱谦益,也不满于明代唐诗学的粗浅与守旧,对前、后七子派和竟陵派的诗学主张进行了颠覆性质的批评,他在《王贻上诗集序》中斥责七子派的诗学主张是“学古而贗”、“师心而妄”、“同归于狂易而已”<sup>[5]765</sup>;在《列朝诗集小传》中斥责竟陵派的诗学主张是:“以凄声寒魄为致,此鬼趣也。”<sup>[6]571</sup>叶燮对宗唐派的诗论观念颇不以为然,正如郭绍虞先生所论:“他于明代七子诗风,病其陈熟;而于公安、竟陵诗风,又病其生新。”<sup>[7]508</sup>从黄、钱、叶的言论中可以看出他们普遍持有的诗学观是:不满于明代唐诗学的粗疏与守旧,不满于明代唐诗学的因循与鄙陋,不满于弃置宋诗学而不知通变,不满于明代诗歌流派诗学主张的琐屑与狭隘。因此,他们从更大的诗学背景出发,从唐、宋

收稿日期:2008-01-07

作者简介:孙纪文(1967-),男,山东泰安人,宁夏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

本文系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研究项目“王士禛诗学文献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诗学可以互相融通的语境出发,提高宋诗学的地位,进而表现出对宋、元诗歌接纳的心理。第二是重构的风气。清初宗宋派的诗论家认为,宋诗学之所以被悬置起来,是由于人们对宋诗的真面目不了解,更不能把握其中的韵致。于是,宗宋派或以宋诗选本的方式张扬宋诗的真面目,如吴之振、吕留良的《宋诗钞》便应运而生,带动了此后宋诗选本的不断出现;或以深入研究的方式言说宋诗的诗学特征,如叶燮就曾在比较中总结宋诗的艺术特征是:“盛唐之诗,浓淡远近层次,方一一分明,能事大备。宋诗则能事益精,诸法变化,非浓淡远近层次所得而该,刻画博换,无所不极。”<sup>[8]601</sup>选本的方式和深入研究的方式是宋诗派的自觉行为,它不但具有补偏救弊的作用,而且对于扩大宋诗学的影响颇为有效。可以说,第二个缘由对于宋诗学的勃兴更具有开辟路径的功效。因为宋诗学不仅需要理论反思,更需要理论建构。如果说第一个风气是在“破”字上下气力的话,那么,第二个风气则重在“立”字上进行落实,即重在以宋诗学的“后出转精”来弥补明代唐诗学的空疏。显然,这种冲击唐诗学的风气是很有批判意义的。

然而,唐诗学的影响是巨大的,清初倡导唐诗学的诗论家依然掌握着强有力的批评话语权。那些尊崇唐诗学的诗论家也发出强有力的反击声音。朱彝尊的诗论可见一斑。朱氏年长王渔洋五岁,与王为友,海内有“南朱北王”之称。朱氏被认为是宗唐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尽管他中年以后亦有习染宋调的趋向,但总体而言,朱彝尊是扬唐抑宋者。在《曝书亭集》中他说:“今之诗家,不事博览,专以宋杨、陆为师,庸熟之语,令人作恶。”<sup>[9]99</sup>又说:“诗家比喻,六义之一,偶然为之可尔。陆务观《剑南集》句法稠叠,读之终卷,令人生憎。……迺者诗人多舍唐学宋。予尝嫌务观太熟,鲁直太生。”<sup>[9]236-237</sup>由此可见朱氏对兴起的宋诗风是相当不满的。此外,清初的冯班、吴乔、贺裳、施闰章、毛奇龄等人也颇不以宋元诗为意。他们或对单纯学宋表示不满,或认为时人批评明代唐诗学过当。连喜好宋诗的宋荦也指责当时的学宋者随波逐流,不得要领,《曼堂说诗》中说道:“迺来学宋者,遗其骨理而捋扯其皮毛;弃其精深而描摹其陋劣。”<sup>[8]417</sup>于是唐、宋诗学之争便成为清初不得不面临的时代问题,而且有文献记载,由于尊崇唐、宋不同的诗学传统竟形成两大诗学阵营。而王渔洋属于宋诗学阵营中的一员。

## 二

王渔洋历来被视为是清初唐诗学的代表人物,他如何又成为清初宋诗学阵营中的一员呢?我们先从俞兆晟《渔洋诗话·序》引述渔洋晚年对平生诗学思想演变的一段回顾谈起:“少年初筮仕时,唯务博综该洽,以求兼长。文章江左,烟月扬州,人海花场,比肩接迹。入吾室者,俱操唐音;韵胜于才,推为祭酒。然而空存昔梦,何堪涉想?中岁越三唐而事两宋,良由物情厌故,笔意喜生,耳目为之顿新,心思于焉避熟。……既而清利流为空疏,新灵寝以佶屈,顾瞻世道,怒焉心忧。于是以太音希声,药淫哇辘习,《唐贤三昧》之选,所谓乃造平淡时也,然而境亦从兹老矣。”<sup>[8]163</sup>这段话包含着渔洋一段曲折的诗学史。即他曾经历宗唐—宗宋—宗唐的回环往复过程。“中岁越三唐而事两宋”,意味着渔洋心中有唐宋诗之争的情结,并且他也承认曾尊崇过宋诗。

那么,王渔洋何时提倡宋诗呢?这个问题渔洋自己没有明说。而且关于渔洋宗宋的始末问题,也确实有些难度。不过已有学者进行了探讨。如张健先生在《清代诗学研究》中认为,渔洋宗宋的标志性行为是从扬州回到北京任上,是年为康熙六年。“至迟到康熙十八年(1679)时,京师崇宋诗的风气已经相当之盛。”<sup>[10]371-372</sup>蒋寅先生在《王渔洋与康熙诗坛》中认为:“王渔洋大力提倡宋诗,是在乡居服阙入朝之后,宋诗风在他的倡导下方始强劲起来。”<sup>[11]31</sup>时为康熙十五、十六年。本文以为,渔洋倡导宋诗的时间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局限于具体的年月是徒劳的,因为他从扬州任上开始到返回京师为部曹官员为终结,他一直尊崇宋诗。但是,随后发生的一件诗学事件却改变了渔洋的诗学观,他开始重新考虑步入尊唐诗学的体系中。所以,与其关注渔洋宗宋的开始时间,不如关注他宗宋的终结时间,即返回唐音的时间。这是本文着重思考的问题。

这件诗学事件本文称之为“徐汪争辩事件”。据徐乾学《十种唐诗选书后》记载,康熙二十二年(1683)孟秋王又旦、汪懋麟、陈廷敬、徐乾学及王士禛集于城南祝氏园亭,为文酒之会。其间徐乾学与诸公盛称渔洋诗歌为国朝正宗,度越有唐。渔洋门人汪懋麟举觞言曰:“诗不必学唐,吾师之论诗未尝不采取宋元。辟之饮食,唐人诗犹粱肉也,若欲尝山海之珍错,非讨论眉山、山谷、剑南之遗篇,不足以适

志快意。吾师之弟子多矣,凡经指授,斐然成章,不名一格。吾师之学,无所不该,奈何以唐人比拟?”徐乾学与之讨论道:“季角(案:汪懋麟的字),君新城弟子,升堂矣,未入于室。新城先生之才,足以挥斥八极,丹青万物,其学问广博而闳肆。年少通籍,四十余年为风雅宗主,海内学者趋之如龙鱼归渊泽。先生诲人不倦,因才而笃,各依其天资,以为造就。季角但知有明前后七子剽窃盛唐,为后来士大夫讪笑,尝欲尽祛去开元、大历以前,尊少陵为祖,而昌黎、眉山、剑南以次昭穆。先生亦曾首肯其言。季角信谓固然,不寻诗之源流正变,以合乎国风雅颂之遗意,仅取一时之快意,欲以雄词震荡一时,且谓吾师之教其门人者如是。先生《渔洋前后集》具在,惟七言古颇类韩、苏,自余各体持择不可谓不慎,选练不可谓不精。其造诣固超越千载,而体制风格未尝废唐人之绳尺。君熟读自得之,何可诬也。……先生何不仿钟嵘《诗品》、杼山《诗式》之意,论定唐人之诗,以启示学者,即近日不须辞费。”<sup>[12]446</sup>这段争辩说明,在汪懋麟看来,渔洋是宗宋派的秉持者,奈何以宗唐派比拟呢?而在徐乾学看来,渔洋指授弟子,各依其天资;汪懋麟性近宋诗,故以宋诗学教之。渔洋的各体诗歌亦大多未废唐人绳尺。结果汪被徐讥笑为渔洋弟子中的登堂而未入室者。徐乾学还规劝渔洋仿照钟嵘《诗品》、皎然《诗式》之意,以定论唐诗而启示学者。渔洋在聆听两人的争辩之后,对徐乾学的讨论颇为满意,按《十种唐诗选书后》的说法是“笑而颌之”。即他默许了徐的观点。

“汪徐争辩事件”及渔洋“笑而颌之”的深层含义很有耐人寻味之处。其一,这表明,渔洋在宗唐宗宋问题上该有选择了,他的态度该昭示于诗坛了,因为连门人都不能把握自己的诗学思想。而且,渔洋也很清楚,当时的康熙皇帝是喜好唐诗的;他更清楚,在康熙十七年他之所以破例由部曹授翰林院侍读学士,与皇帝称赞他“诗文兼优”有密切的关联。其二,这表明,渔洋该为唐诗学的耸动做些事情了,何况他本人早年也中意于唐诗学。其三,这表明,此时该是他重新举起尊唐大纛的时候了。或者可以这样说,自此之后,即自康熙二十二年之后,渔洋的诗学思想便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他已经走入唐诗派的阵营之中。当然,这个走入历程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其中的委曲还需仔细考索。

他重返唐诗学阵营之后所做的事情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关于唐诗学的理论阐发,如有关神韵理论的阐发;二是关于诗歌选本的编纂,如着手《唐贤三昧集》等选本的编纂。前者从学理上进行唐诗学的建构,后者从行动上进行唐诗学的宣扬,两方面互相配合。而编纂《古诗选》可谓渔洋返回唐诗派阵营中所做的第一件事情,也是他首肯徐乾学规劝之意的变通方式。《古诗选》着手编纂的时间正是康熙二十二年,共选五言古诗十七卷,七言古诗十五卷。根据渔洋《古诗选凡例》中的说明可知,五言古诗以唐代陈子昂、张九龄、李白、韦应物、柳宗元这五家为指归,七言古诗以杜甫为宗主,宋、元、明以后古诗隶附其下,源流分明。《古诗选》重新确立了渔洋的论诗倾向,即树立尊唐诗学的大旗。也可以说,《古诗选》的编纂发出了渔洋尊宋诗学终结的信号。

渔洋在唐宋诗学之争中所作出的最终重返唐音的选择,是很有批评史意义的行为。他之所以作出这样的选择,当从多方面的因素去考究。就“外在原因”而言,历史的传承、明代诗学的影响等都可以视作是其中的因素。就“内在原因”而言,渔洋早年形成的且一直爱好唐诗的审美情趣、重感兴重体悟的思维方式等都是其中的因素。而以下三个缘由是最鲜明的。首先,宗宋诗风一开始就受到当时诗论家的批评。施润章在《学余堂文集》卷七中曾转述宰相冯溥的话说:“宋诗自有其工,采之可以综正变焉。近乃欲祖宋、元祧前,古风渐以不竞,非盛世清明广大之音也。”<sup>[13]81</sup>又如朱彝尊:“吟之言诗者,每厌弃唐音,转入宋人之流派,高者师法苏、黄,下乃效及杨廷秀之体,叫嚣以为奇,俚鄙以为正,譬之于乐,其变而不成方者欤!”<sup>[9]83</sup>由于施、朱两人的诗坛地位颇高,又有一批追随者,他们的言论深中宗宋和学宋的流弊,颇具代表性。王渔洋与两人都有交往,两人的批评不可能不引起他的注意,也不能不引发他重新对于“桃唐祧宋”关系的深入思考。其次,康熙皇帝的诗歌趣味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尊唐诗学的走向。据《四库全书总目》的有关提要记载,康熙皇帝尽管对宋、金、元、明四朝诗歌加以御定刊行,有《御定全金诗》七十四卷和《御定四朝诗》三百一十二卷付梓,但就总体诗歌旨趣而言,康熙皇帝尤其爱好和尊崇唐诗。参与编纂《全唐诗》的张玉书在其《御定全唐诗录后序》中就曾说:“皇上天纵圣明,研精经史,凡有评论皆闾千古所未发。万机余暇,著为歌诗,无不包蕴二仪,弥纶治道,确然示中外臣民以中和之极,而犹以诗必宗唐。”<sup>[14]439</sup>这样看来,身处朝廷的王渔洋对于皇帝的诗文爱好倾向是有所领悟的,此后他不

可能大张旗鼓地再倡导宋诗,他的诗学主张也不可能不受到皇帝诗歌趣味的影 响。因此,随之而来的诗学倾向的转变又多了一重政治学层面的缘由。其三,尊唐祧宋的救弊目的。渔洋崇尚宋元诗歌本有纠偏补弊的目的。然而诸多的宗宋者在反思明代唐诗学之肤廓纤仄的同时,却走向浅近流溢的另一端。《四库全书总目》之《精华录》提要曾经披露崇尚宋、元诗歌之后的形势是:“既而宋诗质直,流为有韵之语录;元诗缛艳,流为对句之小词。于是士禛等以清新俊逸之才,范水模山,批风抹月,倡天下以‘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之说,天下遂翕然应之。”<sup>[2]1522</sup>由此看出渔洋改弦易辙而宗唐同样具有纠偏补弊的目的。以上论及的转变因素和着重论述的三方面的缘由,尽管不能完全解释渔洋宗唐诗学转变的深层肌理,但是,至少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渔洋从宗宋派阵营中分化出来而走向宗唐派的诗学领域,确实与时代风会、个人的诗学倾向息息相关。

### 三

进一步说,渔洋的唐诗学思想与清初其他论家的唐诗学思想相比,其“宗唐”诗学思想的内涵和诗学主张有许多与众不同之处。

其一,他尊崇的唐诗学是兼容的唐诗学。兼容意味着对初盛中晚四个时期唐诗的兼容,意味着对历代诗歌的兼容。他的好友施润章在《渔洋山人续集·序》中云:“客或有谓其祧唐而祖宋者,予曰:不然,阮亭盖疾夫肤附唐人者了无生气,故间有取于子瞻。而其所为蜀道诸诗,非宋调也。诗有仙气者,太白而下,唯子瞻有之,其体制正不相袭。……学三唐而能自竖立者,始可读宋、元,未易为拘墟鲜见者道也。”<sup>[15]708</sup>他的僚友徐乾学也在《渔洋山人续集·序》中评论渔洋诗学时说:“虽持论广大,兼取南北宋、元、明诸家之诗,而选练矜慎,仍墨守唐人之声格。或乃因先生持论,遂疑先生续集降心下师宋人,此未知先生之诗者也。”<sup>[15]709</sup>由这两人的话中我们不难看出渔洋唐诗学的融通性质。当然,渔洋的兼容并非没有中心,其诗学思想毕竟有几个要点:首先,他以唐诗为中心,其他各代诗歌都围绕着这个中心而有所择取。其次,在尊崇唐诗之中,他又标举盛唐诗歌,而且他所指的盛唐诗歌的代表人物并非是李白、杜甫,而是王维、孟浩然。再次,他倡导根柢与兴会相融合。根柢与宋诗学的要义有关,而兴会则与唐诗学的要义有关。渔洋在《渔洋文》中认为诗歌之道有根柢、有兴会,二者不可得兼。如果能够兼容的话,“又干以风骨,润以丹青,谐以金石,故能华佩实,大放厥词,自名一家”<sup>[16]78</sup>。这样的兼容才是渔洋唐诗学的理论精髓。

其二,他尊崇的唐诗学是以唐代诗学精神为价值取向的唐诗学,与同时代的其他“宗唐”者迥然有异。渔洋论唐诗,既能区分唐诗初盛中晚的不同韵致,又能从诗歌精神层面把握其中的共性,从而在审美神韵上领悟唐诗的艺术魅力。何世璠《然灯记闻》载康熙三十二年(1693)渔洋论诗法的一番作答很值得回味:七月初八日,登州李鉴湖来谒。问曰:“某颇有志于诗,而未知所学。学盛唐乎?学中唐乎?”师曰:“此无论初盛中晚也。初盛有初盛之真精神真面目,中晚有中晚之真精神真面目。学者从其性之所近,伐毛洗髓,务得其神,而不袭其貌,则无论初盛中晚,皆可名家。”<sup>[8]121-122</sup>

于此,渔洋的用意很明显,他看重的是唐诗的审美境界,是对于具体师法的超越。亦可以见出渔洋崇尚的是唐诗的真精神和真面目,而不是外在的形式和格律。这样的诗学倾向自然与朱彝尊的宗唐诗学观不同,因为竹垞尽管宗唐,但他还不曾从诗歌精神的层面把握唐音,此两家论诗同中有异,也与吴乔、冯班、贺裳主张的晚唐的诗学观不同。吴、冯、贺只看到唐诗风采的局部,而不曾窥见唐诗韵致的全部。

其三,建立在兼容和审美的眼界基础上,渔洋倡导“神韵”说,并提出自己独到的诗学主张。这样的理论建构自然与当时其他宗唐者的诗学思考行为有了区分。尽管施闰章、朱彝尊、徐乾学、毛奇龄等人也有诗学文献传世,并且也有《麈斋诗话》、《静志居诗话》、《西河诗话》等诗话作品存世,可仔细阅读这些宗唐派的理论便可以发现,无论是理论高度还是审美趣味,无论是诗法的探讨还是思维方式都无法与渔洋的诗学主张相并肩。这是渔洋诗学的独特之处,也是他后来遭受嗤点之处。正如郭绍虞先生所说:“大抵渔洋之失,即在标举神韵。标举神韵即立一门庭,门庭一立,趋附者固然来了,而攻击者也有一目标。这还是小问题。最重要的,乃在立了门庭之后,趋附者与攻击者都生了误会,误会一生,流弊斯起。所以我以前说过,由这一点言,王船山就比王渔洋为聪明。”<sup>[17]522</sup>郭先生的论述确为卓见。但是,郭先生

也许忽略了一点,即渔洋的理论建构是时代的需要,也是他理论素质的体现。尽管王夫之不乏特立独行的理论素养,也有宗唐的诗学观念,更有《薑斋诗话》和一系列诗歌批评著作存世,但是,正如杨松年先生在《王夫之诗论研究》中所说的那样:“王夫之在他的诗论与诗评中所提出的问题,前人大都曾经涉及。”<sup>[17]</sup><sup>182</sup>也就是说,在肯定船山诗学价值的同时,我们不要过于褒扬他在诗学理论方面的“结构”贡献,当然也不要简单地将船山的理论阐发与渔洋的理论建构相比较。这是因为,毕竟渔洋的诗学理论不仅有所发明,而且带有一定的意识形态性质。这样的情形与当时还处于民间的王夫之的诗学思想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神韵的内涵中不仅“有风格,有才调,有法律”问题,也有寄托问题,即寄托着一种渔洋所认同的儒雅精神,寄托着渔洋对于时代雅音反思的政治情愫。这样的深意,其他宗唐者是难以企及的,也是难以理解的。

简言之,从诗学发展的脉络看,清初诗学是总结和反思古典诗学成就与鄙陋的时代。而在古代诗歌发展史上,唐宋诗歌代表着两种不同的诗学倾向:唐诗以情韵取胜,而宋诗以理趣取胜。“如何博观悦取,转益多师,而又别出新意,独铸伟辞,这是清代诗人的历史任务。因此,凡是优秀的诗人,决不会只株守一家之言。”<sup>[18]</sup><sup>157</sup>同样,清代的诗论家,尤其是像王渔洋这样有卓识的诗论家也绝不会只尊崇一家诗学观念而不知变化。明确这一点,就可以推知王渔洋虽以尊唐为主,但上溯则源于汉魏六朝,下亦不排斥宋元明。也就是说,他有明显的兼容意识,一种兼容历代诗学精神的意思。所以渔洋的唐诗学不是一个视阈狭窄的唐诗学。

从王渔洋与清初唐诗学的互动关系看,经过对于明代唐诗学的反思之后,渔洋为清初唐诗学的重新建设进行了开放式的理论探索,他倡导的神韵说是可以说古代诗学的集大成理论学说。尽管王士禛本人不过是一个理论总结者,他自己也没有提供多少新的理论范畴,但是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个有见识的诗论家的地位。而清初唐诗学的曲折挺进又为渔洋重新反思唐诗学的得失提供了时间,故没有清初唐诗学的文化底蕴和发展基础便没有王士禛的诗学思想。所以,王士禛可以称为是清初唐诗学理论建构的首席设计师,而清初唐诗学发展的大背景又为王士禛提供了适合的理论平台和“神韵说”生存的空间。

#### 注释:

- ① 邓汉仪:《宝墨堂诗拾》附,中国国家图书馆藏钞本。此段文献为蒋寅先生所提供,见其著《王渔洋与康熙诗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43 页。

#### 参考文献:

- [1] 齐治平. 唐宋诗之争概述 [M]. 长沙:岳麓书社, 1984.  
[2] 永瑆等. 四库全书总目 [M]. 北京:中华书局, 1965.  
[3] 沈善洪主编. 黄宗羲全集 (第 11 册) [M].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5.  
[4] 沈善洪主编. 黄宗羲全集 (第 10 册) [M].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5.  
[5] 钱谦益著,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校. 牧斋有学集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6] 钱谦益. 列朝诗集小传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7] 郭绍虞. 中国文学批评史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8] 纪昀. 四库全书 (第 1318 册) [M]. 台北:商务印书馆, 1983.  
[9] 张健. 清代诗学研究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10] 蒋寅. 王渔洋与康熙诗坛 [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11]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第 394 册) [M]. 济南:齐鲁书社, 1997.  
[12] 纪昀. 四库全书 (第 1313 册) [M]. 台北:商务印书馆, 1983.  
[13] 纪昀. 四库全书 (第 1322 册) [M]. 台北:商务印书馆, 1983.  
[14]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第 226 册) [M]. 济南:齐鲁书社, 1997.  
[15] 王士禛著,张宗楠纂集. 带经堂诗话 [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3.  
[16] 杨松年. 王夫之诗论研究 [M]. 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1986.  
[17] 刘世南. 清诗流派史 [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